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变化

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出现甚早 门类极多。长期以来 手工业一直是中国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占总人口 90% 以上的农民 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男耕女织 起早贪黑 不仅生产了自己需要的农产品 而且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手工业品“，凡田间所需 多以农隙自行修造。外如石工、缝工、木工、泥工、竹工、铁工 非习之不熟者 亦皆以力穡之家 兼营其业”。^① 他们在满足了自己家庭的生活需要之后 也把一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 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手工业生产的主力。另一方面 在一些城镇居民中 也出现了独立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 他们与市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同时也受到行会制度的维系和束缚。

鸦片战争以来迄于 20 世纪 30 年代，手工业生产仍然是中国社会商品生产的主干。它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村的经济命脉，而且是中小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大城市以及对外贸易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最为敏感的生产部门，随时会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升降浮沉 分解转化 呈现出一部斑驳多彩、纷繁杂乱的历史画面。

一、中外贸易格局的转换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

程大璋等：《桂平县志》卷 29，“纪政食货”中 粤东编译公司 1920 年铅印本。

经开始了，而且也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荡。英国棉布的对华输出 开始于 18 世纪 80 年代之初，而英国棉纱对华输出的试探 甚至还要更早一些。1777 年 港脚商人就曾经试销棉纱 13 担于广州。^① 但是，有大约半个世纪之久，这种贸易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直到 1827 年，英国曼彻斯特出产的棉布才第一次在广州能以获得盈利的价格卖出。^② 五年以后，“洋纱”的贸易据说已经成为“对中国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③

当时的广州附近 已经有些织户“用洋纱上机织布”为此曾发生过“很严重的骚动”。当地的手工纺纱业者们“大声疾呼地申述说 洋纱剥夺了他们家中原来从事于纺纱的妇女、儿童的生计。大家决定不用洋纱上机织布 并声称决定要烧毁运入那些乡村的洋纱”。有一些“贫苦人民”甚至“在乡镇遍贴标语 提出警告 凡在广州购纱入乡者，一经查获 立即处死”。据报道 洋纱的生意因此而“陷于停顿”。^④

中国的棉纺织小生产者对洋纱进口的态度比较激烈，对棉花的进口则似乎能够容忍。早于英国出产的棉纱、棉布进入中国之前 英国商人即已经开始试销印度棉花于中国 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时 印度棉花每年在中国的销量已经常常在 40 万担以上，却一直都相安无事。^⑤ 有些布商开始投资织布手工工场 利用进口棉花 雇佣场外手工劳动者从事纺纱 场内则雇佣工人专业织布 产出的棉布供应出口。据说 30 年代初期 出现在广州一地的这种织布手工工场 即多达 2 500 余家 平均每

① E.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p. 161. 转引自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页 5。

② B. H. 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4, p. 146, 1926. 转引自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页 5。

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02, 195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页 248～249。

⑤ B. H. 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4, p. 146, 1926. 转引自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页 4。

家雇佣 20 名左右场内工人。^①

在这里，已经显现出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冲击中国手工业和震荡中国社会的某种一贯性。不过，此时的外国资本还只是一种纯然外部的力量，与鸦片战争后相比，无论在影响的范围、冲击的频率和震荡的强度上，都无法同日而语。

随着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凭借政治强权，楔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古老中国逐渐地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之中。作为一种比较敏感的社会生产部门，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与日俱增的影响，从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从鸦片战争（1840~1842）到甲午战争（1894~1895）的 50 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商品输出。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商品提供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在中国销售的“洋货”除了鸦片、棉纱、棉布和毛纺织品等大宗外，还有肥皂、化妆品、火柴、胶制品、樟脑、蜡烛、酸、碱类制品、煤油等“化学工业制造品”和家具、钟表、镜子、钮扣、洋扇、洋伞、灯具、乐器、衣箱、衣帽等“家用品”，又有金属原材料、工具、机械配件、建筑材料等五金洋货，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种类繁多的洋货大都经由通商口岸，逐渐向中国内地城乡渗透。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的 50 年代，广州售卖洋货的商店就已经在经营“红毛洋灯”、“红毛洋针”等外国工业制品。上海在 1850 年后也出现了一批洋货商店，经营的洋货几乎无所不包。^② 天津虽然开埠较晚，但至迟在 70 年代前也已经出现了“洋货街”。1870 年刊行的《续天津县志》就曾辑入一首题名《洋货街》的打油诗，诗中有句曰：“洋货街头百货集，穿衣大镜当门立，入门一揖众粲然，真成我与我周旋。”^③ 在新开口岸和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pp.305~306, Nov. 1833.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1982 年油印本，页 19。

③ 赵亮春：《洋货街》同治《续天津县志》卷 19，“艺文”4。

内陆城镇 洋货的露面也日渐频繁。1881 年,武汉三镇开设的洋货商店已有 10 家 经营品种包括外国玩具、工具、铅笔、图画、装饰品伞、利器、珠宝、肥皂 等等。^① 连一些农村乡镇也感受到了进口洋货的影响。南浔镇上营建的楼房 已有不少“仿洋式者 其中器具 即一灯一镜 悉用舶来品 各出新奇 藉以争胜。”^② 直隶《玉田县志》也有记载:“洋舶互市……我之需于彼者 至不可胜数 饮食日用曰洋货者 殆不啻十之五矣。”^③ 说日用洋货已达十分之五 恐有夸大之嫌 不过 在这些进口洋货品种中,有许多中国本来亦有相应的手工业生产,则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情况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差异。鸦片战争之前 除了铸币用的银、铜和果腹用的粮食之外 中国对于海外舶来的洋货并无多少需求,而外国对于中国出产的手工业品,却需求甚殷。从当时中外贸易的内容来看 中国的出口以茶叶、丝绸、瓷器等手工业产品为主 进口则主要是粮食、农畜、金属、矿物等原材料。棉、毛织品,数量有限 钟表等物 只作贡品 对中国城乡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益无害。鸦片战争以后 这一贸易格局逐渐被颠倒过来 从而奠定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机制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基本结构。在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中 生产资料仅占 8% 左右 消费资料则占 90% 以上,其中直接消费资料又占到 80% 上下。^④ 显而易见,这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大体上表现出以下几种不同的形态。

① 《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1 年 汉口 页 19 又见武汉市商业局:《商业志·百货行业志》,1984 年油印本。

② 温鼎:《见闻偶记》民国《南浔志》卷 33。

光緒《玉田县志》卷 5,1884 年刊行。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页 72~72。

二、因‘洋货’输入而首当其冲的手工业 开始遭受强劲冲击

在这方面 可以传统棉纺织手工业为代表。

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曾经与中国的手织布长期较量 当英国的棉纺织品同样处于以手工生产为主的阶段 它在中国就没有市场 而当英国进入到机器棉纺织工业的阶段之后 中国手工棉纺织品的竞争能力也就相形见绌了。鸦片战争后不久，已经不仅在此前的一口通商之地广州 也在续开的其他通商口岸周围出现了洋布、洋纱排挤土布、土纱的现象。这种现象 随后又开始由通商口岸周围向临近地区扩散。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更多新的特权 海关为他们所控制 税率再次被降低 内河航运和内地通商的权利也沦于他们的掌握之中，通商口岸从 5 口增加到 19 处 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数额激增。其中，占外国输华货物大宗的棉纺织品，输入数量的增长尤为迅速，并且日甚一日地向中国的广袤内地渗透。

然而 洋纱、洋布两者之中 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洋纱在中国销行增长的势头 远远超过了洋布。从《海关关册》所统计的进口贸易数字来看 鸦片战争爆发的 1840 年 输入中国的洋纱为 1.82 万担，两年后即上升为 3.37 万担 增长了 85% 到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输入中国的洋纱已经超越百万担大关，达到 116.17 万担 半个多世纪里增长了将近 63 倍 进展不可谓不速。

相对于洋纱来说，洋布进口的增长则显得缓慢得多。1840 年时为 52.09 万匹，1845 年一度达到 300 多万匹的高峰，通商口岸地区立刻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压力。当年的福州将军奏报朝廷 称“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 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 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 不复畅

销 因被夷货所占 而闽产之土布土棉 遂亦因之壅滞 不能出口。^① 时在上海的包世臣也记述说 松江、太仓一带“洋布大行 价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② 情况似乎十分严重，其实仔细考察起来，这只是一时一地的短暂现象。洋行商人对中国市场不明就里 盲目输入 以致存货山积 随即不得不大幅度贱价求售。直到 1894 年 海关贸易册上显示的洋布进口不过 1 379.59 万匹，54 年间大约增长了 25 倍 只及洋纱进口增长的不到 40%。

在进口洋纱、洋布价值增长的比较上 亦是如此。海关贸易册的统计显示 从 1867 年到 1894 年 洋布进口值由 1 200 万海关两上升到 3 100 万海关两 增长只有 1.58 倍 而洋纱进口则由 146 万海关两上升到 2 140 万海关两 增加了 13 倍以上。

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 当然在于进口洋纱与进口洋布相比 具有着更加雄厚的竞争力量。也就是在洋纱、洋布进口增长趋势表现出显著差别的 1867~1894 年间 进口洋布价格下降了 26% 而进口洋纱价格则下降了 63%。^③ 中国的老百姓们之所以舍土纱而用洋纱，原因正在于他们敏感地把握住了市场价格的变动。

然而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值得关注 就是洋纱进口比洋布进口更能适应中国传统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至少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外文献里，引进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的记载已经频繁出现 俯拾皆是。各地的方志里 更有许多洋纱进口促进当地手工织布业兴起和繁盛的有趣描述。从特定的角度来看，洋纱的进口正是给中国传统的手工织布业提供了某种自存乃至求得发展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洋纱进口在价格上的大幅下降和数量上的迅速膨胀，阻遏了洋布进口的增长。

这一时期进口的洋纱，大多行销于华南沿海一带非植棉地区的手

转引自《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 页 26。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 页 3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页 1646。

工织布业者 即首先在那些原来已经出现了‘棉纺分离’的地区打开缺口。华南八港进口的洋纱在全国进口量中的比重，1867~1871年占97.9%，1884~1888年占63.6% 降至1893~1894年 仍然高居第一位占44.8%。^①在广东、福建一带 植棉事业早已衰落 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纺纱所用的棉花 先是来自江南和华北 其后改自印度进口的原棉。在这一地区 农家棉纺织生产结合的环节本来就比较脆弱 易于发生自纺与自织分离的现象 实际上正是如此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这里已有‘用洋纱上机织布’的事情发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商品交流扩大 当地大面积地以商品纱代替商品棉，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阻力。当1894年时 福建、广东地区的农家手工织布已经基本上是洋纱洋纬了，手工纺纱业已经‘有如风流云散’以至于‘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②

当地人民之所以舍弃土纱而争用洋纱，道理很简单，因为洋纱便宜。以1887年广州的市场价格为例，1包重300斤的印度棉纱售价57海关两，同等重量的手工纺纱售价则高达87海关两，^③ 差距之大 实在令农家手工纺纱在市场上难以竞争 更不用说这里地处通商口岸 长期受到外洋风习熏染，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与内地迥然不同了。这里的方志记载：“洋纱幼细而匀 所织成之布 自比土布可爱 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 非土布所能望其项背”；^④ 而当时的内地方志上则记载说：“民俗多好土布 以其质坚耐用也。土布以白色为常 其蓝白交错者 曰脂麻点布 织有 M 纹者 曰芦扇布 本色有纹者 曰交理布。此三种已为不经见之物 何论洋布 风俗之朴俭可知。”^⑤ 两相比较 适成鲜明对照。

① 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华南八港为 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

② 丁仁长等：《番禺县续志》卷12。

③ IMC,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87, Guangzhou. 转引自连浩鑒：《晚清时期广东的对外贸易及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页85。

丁仁长等：《番禺县续志》卷1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页224。

经过 50 余年的苦心经营,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行已经显示出数量上越来越多 范围上愈推愈广的趋势 缓慢地然而逐步地克服着中国传统小生产者的执拗偏见,瓦解着农家手工棉纺织生产的顽强抵抗。洋纱洋布已经开始逐渐由沿海城市向内地村镇,再向边远腹地扩散,到 90 年代上半期,华中九港进口的洋纱已经占到全国年输入量的 27.38% 四川湖南等省份也已经成为洋纱广为销行的地区。1890 年,四川省购办洋纱 7 万担“,均于重庆销售”;^① 1895 年 川省洋纱进口量增至 11 万担“,通都大邑 销数日多”。^② 1891~1892 年间 湖南长沙、道州、常德、永州、宝庆、衡州等 11 个城市 经由汉口运进的洋纱年均 2.40 万担。^③ 19 世纪 60 年代,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尚只占 0.56% 到 90 年代中期已经上升为占 18.94%。^④ 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所占的比率 也从 60 年代后期的 3.20% 上升为 90 年代中期的 13.39%。^⑤ 洋纱洋布输入的增长 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生产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严重影响,“洋纱出而纺事渐疏 洋布兴而织工并歇”,^⑥ 这在那些洋纱洋布输入最盛的地区,已经成为严酷的社会现实。

然而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看不到这个方面 是闭目塞听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缺乏敏感的认识 但是如果看不到问题的另一面 事物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就会被人为地简单化。“这就是说 考察这个问

①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 宜昌口 页 51~52。

②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 重庆口 页 10。

森 时 彦,中国近代における 机械制绵の 普及过程」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东方学报]第 61 册 1989 年 3 月 页 498。

有研究估算,1860 年中国手织布业用纱总量约为 6 285 530 关担,当年洋纱输入 35 380 关担 约占 0.56%;1894 年中国手织业用纱总量约为 6 123 870 关担,当年洋纱输入 1 159 600 关担 约占 18.94%,加上国内机纱产量 342 170 关担 再减去非织布用纱匡算 约占中国棉织业耗用棉纱总量的 23.42%。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 225。

估计按折合标准土布计算,1860 年全国棉布应有消费量约为 61 956 万匹 进口机制布 1 988.4 万匹 约占 3.2%;1894 年全国棉布应有消费量约为 68 475 万匹 进口机制布 9 169.7 万匹 约占 13.39%。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 223。

⑤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页 224。

题，既要看到西方机制棉纺织品入侵的一面，又要看到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抵抗的一面”。^① 中国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在越来越激烈的中外商品竞争中每况愈下 这是历史的事实 毋庸置疑 但是对于其遭受破坏的程度及速度，则也应有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估计。 1883 年的《英国驻华各口领事报告》说：“上海 棉纱线消费的巨大增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不仅上海邻近地区如此，全中国也都如此。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一个商店的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棉线。”^② 1886 年的烟台海关报告也称：“烟台进口的印度棉纱 无疑比山东本地生产的更便宜。据说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山东的纺织业，而纺织业是许多穷苦妇女养家糊口的手段。据了解本省的手工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③ 1887 年 烟台海关税务司再一次报告说：“我推测本省的土棉纱已经几乎再没有什么发展了。”^④ 另一方面，1867 年的《海关关册》说：“洋布在中国已经日益广泛使用了。”^⑤ 70 年代初的浙江宁波，“过去中下层人士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洋标布主要流行于本国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 如衢州、余姚、金华便是。”^⑥ 以上种种记载 似乎都说明了中国农村的土纱土布生产根本无力抵抗洋纱洋布的侵袭，业已土崩瓦解。如果不慎重地引用这样的历史资料，自然容易造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被破坏殆尽的印象 然而事实是 上述材料即使所言非虚 也只是一时一地某一方面情况的反映 而且不无片面性和夸大之处 远非事情的全部。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 事物还存在着另外一面 更加值得注意。

与上述英国领事报告所说每个村庄、每家店铺都有洋纱出售的情

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页 6。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页 208。

③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86 年 第二卷 第 41 页。

④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87 年 第二卷 第 43 页。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页 224。

⑥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页 231。

况形成鲜明对照,《上海县续志》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①《吴县志》也说:“光绪二十年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上海及附近地区实际上仍然是手纺纱唱主角。当地的布庄收布,即使有极少数掺入洋经,一被发现,便须剔除。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洋纱在江南手工棉纺织业中的实际地位,以及在时人心目中的尴尬形象。

再让我们看看山东省的情况。西方商人本来希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通商口岸能使他们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新口岸贸易的发展却十分缓慢。19世纪60年代,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深受“捻乱”和清政府“平捻”战争之苦。而当捻军于1868年最终被镇压下去时,山东省又发现,北面的天津和南面的镇江正在侵占省内唯一的通商口岸——烟台的市场。烟台孤悬于山东半岛北部海岸,与内地的陆路和水陆交通又很不发达,命中注定难以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③山东省的西部为重要的产棉区,而全省的棉纺织手工业素称发达。1866年,烟台海关税务司已经注意到,山东本地生产的纺织品“非常好,非常耐用,且在这个省被大量使用。”^④这里开始时进口的是国外出产的“洋布”,80年代后,棉纱的进口量逐渐增加,但是到1882年,烟台进口棉纱只有11288担。4年后,棉纱进口量虽然增长了5倍,但仍然只有56726担之数。^⑤直到宣统三年(1911),考察胶州商务的官员亲眼看到的仍是“外来棉纱减少,系因本省产棉甚富,内地乡民每当冬令农事完毕,皆从事于纺纱。”^⑥20世纪20年代以

① 姚文枬等:《上海县续志》卷8,页28。

曹允源等:民国《吴县志》卷51,页15。

③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57年第80~81页;1870年第11页;1874年第22页。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66年第77页。

⑤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86年第二卷第54页。按:棉纱一担等于133.3磅或60.5公斤。

⑥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胶州口,页43。

后威海一带的农村也还是‘妇女用旧式木机纺织自用 间亦有销于当地市镇。’^① 长山县的民众‘仍有着窄面粗布 即手摇纺纱尚未绝迹。’^② 既然如此 那么所谓 19 世纪 80 年代山东的手工纺纱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歇的说法 显然也就难以令人相信了。

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样如此。1894 年的江苏省南通县“乡人尚未行用机纱，……其时布商收布 凡见掺用洋纱者 必剔除不收。”^③ 僻处内地的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 布料多为土货 县属比户纺织 砧声四起。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用自织布为贵。布质密致耐用 平民一袭之衣 可御数载。”^④ 据数字统计和资料记载，此时洋纱在中国销用棉纱量中只占 1/4 不到 而且主要集中于闽、广通商口岸及附近一些地区 在大多数地方还受着人们的冷遇 尚未在中国的棉纺织生产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至于洋布之取代土布 如前所述 成绩又远逊于洋纱之取代土纱。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代表朴鼎章曾经兴奋地宣称：中国庞大的市场已经向英国棉货敞开，倾英国棉纺织业中心兰开夏纺织厂的全部产量，亦未必能够满足中国一省之需求。^⑤但是 曾几何时，这种乐观地预想很快就成为了泡影，英国的织布厂始终未能获得过这个想象中的庞大市场。在《海关关册》所说英国棉纺织品已经在中国广泛销行的 1867 年 其实洋布进口只占当年全国消费棉布量的 3.2% 实在是微不足道。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 洋布进口量尚未超过全国年消用棉布量的 13.39%，侵占土布商品市场的绝对份额也不多。因此 那种‘迄今通商大埠 及内地市镇城乡 衣大布者十之二三 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⑥ 的论断 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当是时 真实的情况更

①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汇编》第三分编 威海县 页 11。

②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汇编》第六分编 长山县 页 2。

③ 张謇：《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历史》，《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1910 年版 页 111。

④ 梁崇鼎等：《贵县志》卷 2，“社会生活状况”，1934 年铅印本 页 127。

⑤ China Mail(Hong Kong), Dec. 2, 1847.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7，“纺织”页 20。

可能是‘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① 同样是浙江省的历史资料显示购用洋布的多系‘士庶之家’，农家则尚用土布‘以为非此不暖且不厚实也’。^② 土布厚实耐穿‘使其受到普通劳动者的青睐’，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贫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③

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厂商曾经专门组织考察团‘派遣来华研究洋布难以推开的症结之所在’，结论之一也是由于中国的消费者喜好土布的温暖而耐用。这种消费偏好，当然不是外国商人短期内就能够加以改变的。英国的棉纺织厂商曾经着力搜集中国的土布货样，以寻求市场竞争的对策。其实‘中国土布的厚重温暖毫无技术秘密可言’，农家手工纺制的只能是‘6~10支之间的粗纱’，织成之布自然要比用‘20~30支纱’织成的洋布厚重得多。单就技术而论，英国的棉纺织厂‘不费举手之劳’，很容易就能纺制粗纱织布‘以适应中国消费者的胃口’，但是这样一来‘布匹的原料成本就会提得很高’，从而在市场价格上将无法与中国的土布竞争。

说到底‘洋纱洋布之所以未能畅行无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遭到了中国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顽强抵抗。中国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部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的帮助以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只要以“较棉花略高的价格把布匹卖出，就能把再生产维持下去”。^④ 虽然‘曼彻斯特的制造家们看到[中国]农舍这种简单的织布机及其附件也许会发笑’，但是这种织机能够完成这一工作‘而这个民族不倦的勤劳则代替了蒸汽力’甚至‘胜过了蒸汽动力’。^⑤ 鸦片战争结束后20年的60年代末期，英国驻汉口的领事曾经把洋布和土布的市场价格作过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颇令他丧气，洋布价格按重量计算虽然低于土布，但是相差有限，随着棉花价格的下降，土布将更加便宜，洋

梁崇鼎等：《贵县志》卷2，“社会生活状况”，1934年铅印本，页127。

② 民国《平阳县志》卷19，“风土志”。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35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33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335。

布终将被赶出中国市场。^①当然 历史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发展。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成本节约和时间节省，对大工业的机制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尽管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延缓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 但与机器大工业竞争 毕竟是没有前途的。其原因 除了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侵略战争所攫取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之外，机器大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 商品更加物美价廉 成为其“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② 小农自然经济单凭本身的力量 企图长期阻止外国机制工业品的输入 或者与外国机制工业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竞争，这无论如何是不会成功的。中外历史发展，一再证明了这一规律。在下面的文字中，也会不断地看到这一点。

三、因“外贸大畅”而繁荣起来的手工业， 获得一定程度发展

这种类型的手工业 大致可以缫丝、丝织业作为代表。

中国是丝绸的祖国。在历史上，中国长期扮演着世界上蚕桑丝绸生产技术和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应者的角色。由于蚕桑丝绸生产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和独特技艺 欧洲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发展迟缓 能获得的原料茧十分有限。近代缫丝工业尽管从 19 世纪上半期开始在欧洲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发展迟滞的制约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到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 更由于欧洲蚕瘟病流行，一时防治乏术 蚕茧原料来源益形紧张 近代缫丝工厂许多被迫停业关闭 生丝原料更加仰赖东方的中国和日渐崛起的日本。^③ 丝织业则是欧洲纺织业中工厂化生

^① Great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9 ~ 1870, Hankou, p. 17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页 255。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 第十二章 中译本，1963 年版）。

产最为落后的部门。从 19 世纪中叶左右 才开始出现动力织绸机 , 一时之间 推广的步伐也相当缓慢 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手工工场式生产组织和手工操作的生产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传统丝织手工业生产的优势。因而 当鸦片战争过后的一段时期内 在外国棉纺织品汹涌而来 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 挤占了中国手工棉纺织品市场的同时, 中国的丝绸产品依然源源输出国外。这种输出 更由于闭关状态的打破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而日渐扩大 呈现出‘益呈蓬勃’^① 的情景。

在历史上, 生丝和丝织品一直是中国输出商品的大宗。海外各国对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有着更多的需求, 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本可因应海外需求, 进一步扩大出口, 然而却受制于明清历朝政府的严厉禁限。明朝政府曾经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 绢、丝绵私出出境货卖及下海者 杖一百 挑担载货之人减一等。货物船只并入官。”^② 表明了统治者对于民间丝绸海外贸易的基本态度。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清初 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义军 断绝大陆人民对据守台湾和沿海岛屿的郑成功势力的支援, 严禁沿海居民出海经商。清政府分别于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十三年 (1656 年) 及康熙元年 (1662 年) 四年 (1665 年) 十四年 (1675 年) 五次颁布“禁海令”。“沿海省份应行严禁, 毋许片帆入海, 违者立置重典”。^③ 又于顺治十七年 (1660 年) 及康熙元年 (1662 年) 十七年 (1678 年) 三次下达“迁海令”,^④ 在北起山东、南至广州的广大沿海地带 强制东南沿海各省居民一律从海岸向内陆迁居 30 ~ 50 里。一般民众的海外贸易和沿海渔业生产, 自然也在严禁之列 谕旨规定:“福建、浙江、江南三省所禁沿海境界, 凡有官员、兵民违禁出界贸易 及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 不论官民 俱以通贼论处斩 货物家产俱给首告之人。该管文武官不能查获 俱革职从重

苏州市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

^② 熊鸣岐:《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昭代王章》卷 2 又见舒化:《兵律·关津》,《大明律附例》卷 1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卷 120。

^④ 《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 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776。

治罪。地方保甲知情不首者 处绞。其违禁出境之人 审明系何地方出口 将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立斩 不知情者从重治罪。^① 如此严峻的海禁政策 造成人民流离失所 商贾元气大伤 由此产生的物价腾贵、饥谨连年、盗贼频出等等 也都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②

这种落后的海禁政策先后持续了近 30 年的时间 使得清朝初期的海外贸易基本陷于瘫痪 不仅给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痛苦 对社会经济造成深重灾难,同时也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③ 其间,一些朝中的大臣、特别是闽、粤、浙、苏沿海省份的地方官吏一再反对禁海 主张开海贸易 他们不断上疏皇帝 反映实行海禁所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失业和铸铜枯竭的情况 认为只有开放海禁才能够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和‘铸铜’‘匱乏’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④ 从康熙十五年(1676 年)起 这种反对禁海、要求开放海外贸易的声音日甚一日,但是当权的满汉守旧大臣则坚决拥护和主张严格实行海禁 认为宁可少要一些钱 也不能和外国贸易 以免引起“不虞”。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康熙皇帝才认识到:“向令开海贸易 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 若此二者民用充阜 财货流通 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 非贫民所能 富商大贾 懋迁有无 薄征其税 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 小民又获安养”。^⑤ 于是 宣布结束海禁 实行开海贸易。^⑥

1684 年 清政府于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设置闽海关和粤海关,又于次年在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设立浙海关和江海关 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事宜。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个海关的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76,《刑部·兵律·关津》。

② 田中克己「清初の支那沿海迁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る」一、二「历史学研究」卷 6,第 1、3 号 浦廉一「清初の迁界令の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5 号,1954 年。

刘序 枫「十七、八世纪の中国と东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贸易政策を中心に」沟口雄三、浜下武志等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地域システム」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版 页 87~129。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 页 14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页 18。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采》。

表明了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关心 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征收关税 也包括扼制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对民间的海外贸易施行严格的管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于严苛之处 但是比起明末清初的‘禁海令’及‘迁界令’来 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要宽松得多了。

开海贸易以后 形势一度好转 丝绸海外贸易有所复苏 满载生丝和丝织品的商船 又开始扬帆出海 欧美国家也纷纷远渡重洋 来中国购运丝绸“泰西之来中国购丝也 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其时海禁初开，番舶尝取头蚕湖丝运回外洋”。^① 中国商人也以贩运丝绸出口有利可图 趋之若鹜。闽、广客商到江浙丝绸产区贩运丝绸出口的“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 动辄百万 少亦不下八、九十万。此外苏杭两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者尚不知凡几”。^② 据统计，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至六十一年（1722 年）输往欧美的生丝为 1833 担 到乾隆五年（1740 年）至四十四年（1799 年）增加为 19200 担；^③ 据东印度公司的《对外贸易》资料记载 乾隆十五年中 仅英国东印度公司经由粤海关输往欧洲的中国丝绸 就有生丝 1397 担 丝织品 18229 件。

然而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为止 清王朝对于海禁一事，一直屡开而复禁。禁止海外贸易的时候，措施坚决而果断；开放海外贸易的时候，态度则勉强而迟疑，还附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上谕：“将丝斤严禁出洋 并准部议 将绸、缎、绢一律严禁。”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各官 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 每丝一百斤 发边卫充军 不及百斤者 杖一百 徒三年 不及十斤者 枷号一月 杖一百。…… 船只货物俱入官。^④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英国商人要求来华购买丝绸，“情词迫切”经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循照东洋办铜商船搭配？缎之例 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 二蚕湖丝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之意”但同时依然规定：“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 仍禁

陈忠倚：《清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

② 《乾隆上谕条例》。

据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第一卷、第二卷有关篇章的数字统计。

杨廷璋：《清复丝斤出洋旧使疏》，《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 卷 55。

如旧不得影射。^①这样,就把本来属于国际商品的中国丝绸的市场,人为地局限于国内。

到鸦片战争前的 1830~1837 年间,中国每年平均从广州输出生丝 9 058 担。鸦片战争以后生丝出口迅速攀升,1845 年已有 2 万担,1874 年增为 6.84 万担,价值 1 946 万海关两。到 1894 年生丝出口上升为 8.32 万担,价值 2 728 万海关两,减去其中的厂丝 2.25 万担、1 205 万海关两,土丝出口为 6.07 万担,价值 1 523 万海关两,较之 1840 年前增加了 5.74 倍。^②生丝输出在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843~1845 年间约为 17%~28%,1852~1858 年间上升为 31%~45%。^③60 年代以后,生丝和绸缎类出口一直在中国的出口总值中占有很高的比重,1860 年为 60.10%,1869 年为 32.41%,1879 年为 39.60%,1889 年为 37.55%,1894 年为 33.29%,^④均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进一步分析比较生丝在国内外市场销售量和值的消长,更能够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缫丝手工业生产的促进。1840 年前夕生丝内销和外销的总量为 6.4 万担、总值 1 067 万海关两,到 1894 年增长为 16.02 万担、价值 5 166.14 万海关两。其中,生丝内销的量和值 1840 年前夕为 5.5 万担、864.83 万海关两,分别占到当年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的 85.94% 和 81.05%,到 1894 年内销生丝的量和值上升为 7.7 万担、2 438.13 万海关两,在当年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下降为 48.06% 和 47.19%。与之相反,生丝的出口量和出口值 1840 年前夕为 0.9 万担、202.17 万海关两,分别占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的 14.06% 和 18.95%,到 1894 年生丝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增加至 8.32 万担、2 728.01 万海关两,在当年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① 尹继善等:《复议弛洋禁丝斤以便民情折》,《皇朝文献通考》卷 33,“市余考”。

鸦片战争前的数字 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页 413。鸦片战争后的数字,参见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附录 21),《1859~1948 年全国桑蚕丝出口品种数量表》附录 22),《1859~1948 年全国桑蚕丝出口品种价值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T. 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p. 45.

据历年《海关关册》计算。